

新时期私企劳资矛盾产生的原因

刘颖、庄锡福在《科学社会主义》2008 年第 2 期撰文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虽然不表现为阶级对立，但如果制度、措施不当，人民内部矛盾的劳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以激烈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新时期私营企业劳资矛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私营企业劳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矛盾关系。雇主作为资本的人格化的代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冲动和外部的市场竞争压力都会驱使其尽力

压低生产成本。如果雇工利益分配权被过度侵犯，超过了雇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生存的极限，雇工就可能选择非法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力，劳资矛盾以激烈的冲突形式表现出来。私营企业劳资矛盾就不仅是企业内部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问题了。第二，雇工方无组织或低组织化，形成劳资双方力量不对等。从目前我国私营企业劳资双方力量对比来看，强资本、弱劳动将是长期存在的力量对比关系。由于政

府的强力措施，私营企业工会的组建率表面看来增长很快，但加入工会的雇工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极低，加入工会的雇工通过工会解决劳资争议的更少。第三，劳动制度安排的缺失。1.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国家尚未建立起一套与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相适应的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法规体系；2.集体谈判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作为代表雇工利益的工会组织，没有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自身职能的转变；3.雇工维权的负

担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为“一调一裁两审”制，而且未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处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种体制实际上确立了“仲裁前置”的原则。而一般的仲裁案件审理期为 60 天，复杂的仲裁案件审理期是 90 天，并需交纳一定的仲裁费。显然，“仲裁前置”对于维权的职工个体来说，时间和投入都成了一种负担，相应增大了雇工的维权成本；4.劳动执法监察力度的薄弱。

汉字教学中“新说文解字”法的应用限度

罗卫东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撰文指出，汉字是意音文字，其形义联系使人们在诠释汉字时就可以“因形知义”、“据义析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分析小篆形义关系的著作。而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简化汉字使得部分汉字形义关系又产生了变化，人们再不能完全依据《说文解字》诠释汉字。于是在汉字教学领域出现了对简化字进行重新诠释的“新说文解字”，为了教学可以不讲求汉字的传统构字理据，可以“穷想办法”，编字理来教学生。那么如何使“新说文解字”避免随意性、主观性呢？在现行汉字层面，存在有形义联系、形义联系脱节、形义联系回归、形义联系后生、形义联系交错、无形义联系等情况，因此，诠释复杂的形义关系时，“新说文解字”应立足现代，参考古代，依据简化汉字形体寻求它们的形义联系。单字的诠释需在全面分析汉字系统基础上进行，避免诠释的主观性。只有从系统出发，据古释今，才能科学地将形义诠释应用于汉字教学中。

犹太—希伯来文学的民族特性

王向远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7 期撰文指出，从宏观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把犹太—希伯来文学的民族特性概括为三个“一”，即：一本书——《希伯来圣经》与文学的一元化；一个神——耶和华的文学抽象；一个梦——从亡国到复国的题材主题。希伯来人的文化显示出罕见的单一性，希伯来文化与文学全部从属于他们的一神教——犹太教，因而流传下来的希伯来文献及文学作品在数量上出乎意外得少，简单地说，就是“一本书”——《希伯来圣经》。《希伯来圣经》决定了近现代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形象性外，注重抽象的哲学思考的表达，使犹太人及有犹太血统的作家及作品，往往比其他民族的作家表现出更显著的思想深刻性。犹太—希伯来民族是一个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民族，犹太—希伯来文学也是一种四处流浪的“客民”文学。在自己的故乡，恢复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是犹太—希伯来的梦想，从亡国到复国是其永恒的题材主题。一部希伯来文学史，也是一部丧失希伯来语言文学的家园、又回归这一家园的历史。

从明代服制的兴衰看中国皇权与礼制

原祖杰在《求是学刊》200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儒家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是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的，并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在维护皇权的同时，也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与之相通，服制作为儒家以礼治国的一项基本内容，其作用一方面在于加强专制，通过对不同等级服装的款式、颜色和装饰所作的规定打扮出一个天下独尊的君主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强化与服饰相关的礼仪规则，以及维护这套规则对于王朝统治的意义进而形成对帝王本身行为的约束。明代服饰制度的确立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明初统治者着眼于建立和巩固以皇权为中心的统治秩序，通过更定服饰制度，重新规划服饰等第，确立了一种尊卑观念，构筑了一个鲜明的围绕官本位的权力阶梯和等级结构。明初服制的兴盛，表明旨在加强君主专制的服制规章迎合了明初统治者加强皇权的强烈意识。然而，皇权观念和以其为中心建立的礼仪制度本身的矛盾和缺陷，儒家思想中“王在礼下”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最终导致明代服制在明中期以后即走向衰落。可以说，明代服饰制度的兴衰演变过程恰好印证了中国古代皇权意识与礼仪制度之间的和谐与矛盾的复杂关系。



观点集锦

“八大”前后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

孙建娥、谭献民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 年第 3 期撰文认为，“八大”之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两次报告指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和人生观转变的社会实践和客观规律；而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逐步从爱国主义的情感转向民族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则是其思想转变的奋斗历程和主观选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和格外重视的力量。“八大”以后，特别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又一次报告中，坚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属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党应当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这个性质上看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现实作用。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认识，为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出“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奠定了基础。

出版业有必要对不当的“创新”说不

阮中强在《中国图书商报》撰文指出，对于出版业来说，不少有益的创新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比如，有的出版社在组织机构创新上，在原有的编辑部的基础上又专门设立选题策划部、营销部，使得分工更合理，更有利于图书的市场化运作；有的注重图书形式的创新，使封面设计、图书开本、内文排版更有时代感，为读者所乐见；有的还在渠道上下工夫，如把书卖到超市

里，闯出了一片蓝海；有的积极地探索数字出版领域，为出版业打开了不少想象空间。但我们也应冷静地看到，如果过分地迷信创新，就容易为创新所“迷惑”而陷入迷局。如下几种表现：一是太追求新奇，仅仅为了创新而创新，大量开发新奇的图书选题，这种创新大多是部分出版人臆想出的，并不是读者真正的需求，必然为市场所抛弃；二是图书的文字采用让人不知云里雾里的网络符号，前些年曾经风风火火过一阵子，现在也为市场所淘汰；三是容易被社会上的热点所迷惑，投入自己所不熟悉的房地产、IT 业，投资风险可想而知；四是抛弃或忽视已有的优秀图书，不去做更深入的市场开拓，而是寻求新品来替代；五是采取类似娱乐圈里的那种比较恶俗的宣传营销方式，以为是“新”，但效果实在是让人惨不忍睹；六是不在图书质量上创新，而是在图书的包装上花心思，“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例子并不鲜见。出版业与其一味求新，不如埋头做出更优秀、更能经受市场检验的图书，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创新。

孔子的编辑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王继洲在《齐鲁学刊》200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孔子在整理、编辑“六经”过程中阐发的编辑思想十分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发认识到孔子的编辑思想及其编辑实践，对后世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孔子的编辑思想主要有：1.“垂世立教”的明确编辑宗旨。孔子希望经他和其弟子们整理、编辑过的古代文化典籍能够流传于世，达到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2.孔子具有“信而好古”的热爱古代传统文化的执着编辑情怀。3.孔子主张实行“述而不作”的高超编辑技巧。4.孔子坚持“多闻阙疑”的严谨编辑态度。孔子的编辑思想对于当代广大媒体的编辑来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认真研究、

传承这份宝贵遗产，有利于时下媒体编辑工作的健康发展。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社会来讲，媒体编辑必须承担国家、社会赋予的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责任，具有传承中华文明的强烈使命意识，继承、光大孔子“述而不作”的编辑技巧，坚持严谨的编辑原则，使自己编辑的作品体现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对促进当前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微观效应分析

侯伟丽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撰文认为，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企业要负担两方面的成本：一是为削减污染支出的治污设备的安装和运行成本；二是为排放的污染支付费用。从静态考察，这些加大的成本会影响企业利润。如果企业将这些环境成本通过价格传递给消费者，就要承担由此造成的市场需求减少、竞争力下降的损失。从动态考察，由于人们的偏好会发生变化，企业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变化的，同时由于企业自身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是变化的，企业的供给曲线也是变化的，这使得环境成本内化不一定导致企业利润减少、竞争力下降的结果。实际上，一些对微观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显示，环境成本内化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因为内化的环境成本一方面会加大企业的负担，但另一方面也会激励企业通过提高原材料和能源使用效率的方法消化环境成本。在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绿色产品市场逐渐扩大的条件下，积极防治污染还会使企业获得新的市场支持。另外，在环境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环境成本是企业经营者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之一，企业积极防治污染有利于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这样，污染防治不仅不会降低反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

清代塞外围场的资源管理

赵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清廷对塞外围场的管理办法还不能与今天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或者说与可持续发展计划完全的等号，但在管理严格有序的时段中，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对自动动植物环境资源的保护作用。从皇家狩猎禁苑的诞生直到现在，大量的已经制定的政策可能对保护森林和动物发挥了作用，但这不是这些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就如对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素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孟泽思所说：“边境防御、内部安全、意识形态机制所采取的土地分配的特殊模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是生态保护主义者的明显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不管怎么说，清前期管理保护围场生态资源的目的很明确，完全是为了维持“骑射旧业”，是为了对北方地区的统治，是加强皇权的手段，是清廷权威的体现。换言之，是以维护围场资源的手段来达到巩固政治统治的目的。

(文章均摘自《新华文摘》)